

未名译库
语言与文字系列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俄]B.A. 伊斯特林 著
左少兴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2-38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俄)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2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

ISBN 7-301-00864-3

I.文… II.①伊… ②左… III.①文字-起源 ②文字-发展
IV.H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731 号

В. А. ИСТРИН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

©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5 г.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书 名: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著作责任者: [俄]B. A. 伊斯特林 著 左少兴 译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0864-3/H·010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开本 17印张 489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2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辜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赢、赵萝蕤、杨周翰、郭麟、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

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芑、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为一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 年 3 月

再版说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7年和1989年两度印刷出版《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译本。第一次印刷5000册，很快便销售一空。随后，于1989年又印刷5000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大学人在“三个面向”的指引下，开阔了视野，对世界古今文化日益产生浓厚的兴趣。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研究、了解世界古今主要文字的类型及其发展历史，对于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素养无疑会起良好的作用。

第一版的《译者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科学性和知识性统一。”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普遍反映此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既是学术专著，又是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读物。

译本出版后，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而且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一些高校的人文社科专业还把它作为辅助性教材，某些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指定为必读书。1988年，北京大学校庆90周年时，曾授予该译著北京大学第二届学术著作奖。

这个译本不仅在国内许多高校（包括台湾一些大学）“流行”，而且被某些学术研究和出版机构“收藏”。它还“远渡重洋”：“反馈”到该书作者维·亚·伊斯特林博士的母校——国立莫斯科大学，“交流”到美国伊阿华大学（艺术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外文系）等高校。

近年我国某些学者在有关语言文字问题上有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在谈到“斯拉夫-俄罗斯文字”时，一方面说，“9世纪中叶”“在罗斯出现了两套字母”——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即“字母表音文字”（或称“拼音文字”），另一方面又说，“罗斯最早的（或曰最初的）”的一种图画文字“出现于10世纪中叶”。这种说法不仅

违背文字发展史的普遍规律,而且明显不符合斯拉夫-俄罗斯文字发展的历史事实。这个译本的再版,必将有助于澄清有关“斯拉夫-俄罗斯文字发展”的某些史实。

再版重排过程中,译者对书中极少数地方稍有改动,同时使某些译名、用语更确切、规范。

在新版问世之际,译者对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再次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使用过或将使用此译著的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译者 左少兴

译者前言

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рин, 1906—1967)教授是苏联著名的书籍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艺术系,语言学博士,长期在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工作,对苏联印刷出版事业贡献颇大。

维·亚·伊斯特林的这本书,初名《文字的发展》,1960年问世之后,受到苏联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得到文字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术界的好评。作者采纳了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做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于1965年(即他去世前两年)出版了第二版,书名改为《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译本就是依据第二版译出的。

这部著作以社会经济、文化为背景,比较全面地论述世界各主要文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言特点等方面谈到文字的类型学和分类学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文字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阐述人文科学各学科与文字及其发展历史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作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比较正确地分析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途径,描述从远古图画文字到现今许多文字体系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对文字发展的前景做了探索。这本书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本比较通俗的知识性读物,包含有大量的史料和各方面的资料,并有一百六十多幅插图。可以说,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科学性和知识性统一。

世界各种文字体系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世界古典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正确地指出:“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见《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翻译此书,希望它在我国的文字学和文字史以及世界古典

文明研究方面起些借鉴作用。

本书为理论著作，涉及的学科颇多，又有不少术语。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参考国内外有关著作和各种工具书；此外，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请教了北京大学季羨林、杨业治、刘麟瑞、裘锡圭、殷洪元、王廷荣、赵登荣、赵振江、叶奕良、崔荣林、张会成等学者专家，得到了他们的宝贵帮助。特别要指出的，北京大学胡双宝同志为本书的译文和某些注释做了许多工作。在此，我们谨向以上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深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很欠缺，为此，我们诚恳地请广大读者，特别是学者专家们，对此译著提出批评意见。

左少兴

1986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

《语文建设》1988年第5期所刊顾越书评对阅读本书有所帮助，趁重印之机，附于书后。

目 录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I
再版说明	III
译者前言	V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及其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7
第二章 文字的类型、分类和术语的问题	23
第三章 原始文字的起源及其特征	47
第四章 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83
第五章 音节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160
第六章 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	234
第七章 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	273
第八章 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302
第九章 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苏联 各民族的文字体系	370
第十章 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	477
结 论 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发展远景	499
关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528

引 言

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文物的发现,文字史更加丰富了。只要指出下列文物的发现就足以说明问题:古代苏美尔铭文、古代埃及铭文、原始伽南铭文,第三—四世纪东斯拉夫的历法符号,九世纪末期保加利亚(原始斯拉夫)文字,诺夫哥罗德白桦皮文据,解读了乌加里特楔形文字、原始比布洛斯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以及玛雅文字。

这些发现展示了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斯拉夫文字以及其他许多极重要的文字体系发展初期的新面貌,并且引出了有关最古老的字母-音素文字^①起源的某些新理论(即起源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原始伽南文字、比布洛斯文字的理论)。

最近几十年的实践,特别是苏联某些民族的新文字体系的创立,使文字史有了许多新的内容。

在积累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国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字史的新的总结性著作:捷克有 Č. Loukotka 的《文字的发展》(*Vývoj písma*), 1946年(227页);英国有 D. Diringer 的《字母。人类历史的钥匙》(*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②,第1版,1948年,第2版,1949年,第3版,1952年(607页),他的另一部著作《文字,它的起源和历史》(*Writing, its origin and history*),1962年(262页);美国有 I. Gelb 的《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1952年(295页);A. C. Moorhouse 的《字母的凯歌》(*The Triumph of the Alphabet*),1953年(223页);法国有 J. Février 的《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第1版,1948年(608页),第2版,1959年(612页);M.

① 这里说的“字母-音素文字起源”,是指腓尼基字母-音素文字(腓尼基字母)的起源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起源”论,见本书第六章有关部分。——译注

② 英国文字史学家 Diringer 的这本书,在本书中常简称为《字母》。——译注

Cohen 的《文字》(*L'écriture*), 1953 年(130 页); M. Cohen 的《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 1958 年(三卷, 700 多页); 德国有 H. Jensen 的《文字的今昔》(*Die Schrif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第 2 版, 1958 年(584 页); 南斯拉夫有 Zv. Kuludžić 的《文字史》(*Historija pisama*), 1957 年(868 页); 西班牙有 M. Aguirre 的《世界的文字》(*La escritura en el mundo*), 1961 年(514 页)。

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本书第 1 版问世(1961 年)之前, 我国惟一的一本非翻译的总结性著作是 Я. Б. 什尼采尔的《图解文字通史》(*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письма*) (1903 年), 但此书已完全过时了。^①

苏联作者的著作中, 阐述文字学的一般理论原理的只有 Н. Я. 马尔院士的几部著作(《用雅弗理论阐述“书”(книга)和“文字”(письмо)这两个术语的起源》, 1907 年, 《语言和文字》, 1930 年, 《文字和语言》, 1938 年), И. И. 墨山宁诺夫院士的一部著作《论文字和语言的阶段性问题》, 1931 年)。最近几年, 在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 在百科全书中列出了许多词条。其他一些著作或者研究一些重要的, 然而却是局部性的文字史问题(如 А. В. 阿尔齐霍夫斯基、Ю. Д. 杰舍里耶夫、И. М. 季亚康诺夫、Ю. В. 克诺罗佐夫、Н. И. 康拉德、М. А. 科罗斯托夫采夫、Д. С. 利哈乔夫、С. Я. 卢里耶、И. М. 鄂山阴、Б. А. 雷巴科夫、В. В. 斯特卢威、М. Н. 季霍米罗夫、С. Л. 托尔斯托夫人等的研究), 或者是些通俗读物(如 В. А. 科切尔金的《文字史概要》(*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исьма*), 1955 年; Б. Л. 伊万采夫的《由图画到字母》(*От рисунка до азбуки*), 1957 年, 等等), 或者是一些语言学、古文字学、书籍史著作中, 仅仅顺便

^① Я. Б. 什尼采尔的这本书, 除了谈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一节以外, 主要是复述 1880 年维也纳出版的 K. Faulmann 的《插图文字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Schrift*) 这部著作。什尼采尔这本书的优点是有许多复印古文献的带色的插图和附页, 本书第 2 版采用了其中几幅。

谈到文字史的问题^①。

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 Ā. Loukotka 的《文字的发展》(据 1946 年版)和 1963 年出版的英国学者 D. Diringer 的《字母》(据 1949 年版)。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一，这两部著作所依据的材料，注明时间是 1945—1948 年，在很多方面已经陈旧；第二，这两部著作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距甚远，而且有原则性的缺陷：没有分析文字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阐述文字史时差不多没有考虑文字史同社会史及语言特点的诸多关系；采用已经过时的体系类型学和术语学；文字的单一起源论和神造文字说起源论；夸大宗教在文字史中的作用。^②除了 Ā. Loukotka 和 D. Diringer 的这两本书外，苏联还翻译出版了如下三部有关古文献解读史的著作：K. Kepam 的《诸神，陵墓，学者》(1960 年)，I. Friedrich 的《失传的文字和语言的解读》(1961 年)和 E. Doblhofer 的《符号和奇迹》(1963 年)；I. Friedrich 的这本书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

本书不企求担负普通文字史专著的任务。它的基本任务是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如下几个文字理论的原则问题：文字的本质及其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文字的类型学和术语学；文字产生的条件、来源和时间；决定文字一般历史发展的因素；文字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和制约不同民族的文字特点的各种原因。从已成定论的理论原理的角度来分析最主要的文字类型和文字体系——象形文字(如古代汉字)，词素文字(如现代汉字)，音节文字(如印度文字)，辅音-音素文字(如腓尼基文字)，古代元音-音素文字(如希腊文字)，斯拉夫-俄罗斯文字以及其他文字——的起源；还分析书写符号的特殊形式——数目字、科学符号、标点符号等等。其余的文字理论问题几

① 论述斯拉夫-俄语的文字的起源和理论的著作为数较多，但是只有少数作者——И. А. 博杜恩·德·库尔滕奈，А. В. 谢尔巴，В. А. 雷巴科夫，А. А. 列昂节夫——涉及一般文字理论的问题。

② Ā. Loukotka 的书请参阅 E. И. 卡缅采娃的书评(《历史问题》，1952 年，第 8 期)；D. Diringer 的书参阅此书的俄译本编辑 И. М. 季亚康诺夫写的评论。

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包括：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字体系的语音(音素)成分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应在有关文字各个体系的著作中加以研究。本书只部分涉及古文字学的问题和文字不同体系解读的历史^①。本书完全不探讨这样的文字体系：虽然它们也用来传达言语，但只有狭窄的专门用途(如速记法、密码书写法、音标法)；同样也不涉及用来记录(非言语的)音乐、律动等书写系统。

由于本书的目的以理论阐述为主，所以某些中间类型的文字体系——由表词文字到音节文字(例如苏美尔文字体系)或者辅音-音素文字(例如埃及文字体系)的过渡类型，不是在一章内而是分在几章中加以研究，并且有条件地从这些文字体系中分出表词字的、音节的和辅音-音素的要素；同时还要谈到上述每种文字体系中这些要素结合的原则。由于这一原因，本书只详细研究那些在世界范围的文字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文字体系以及具有特殊理论意义(例如，复活节岛的文字)的文字体系；对于其余的文字体系，只确定它们在文字史上的地位。

本书第1版^② 主要依据作者早先就此题目所发表的论著：《文字史的某些理论问题》(《语言学问题》，1953年，第4期)；评 M. Cohen《文字》(俄译本，——《古代历史通报》，1955年，第2期)；《关于字母-音素文字的起源》(《世界文化史通报》，1957年，第4期)；《十月革命和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同前，1959年，第2期)；《关于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同上，1960年，第6期)；《文字，分类学、术语学及发展规律》(L'écriture, sa classification, sa terminologie et les régularités de son développement)；《世界史手册》(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奈沙台，1957年)；《文字的类型与语言的关系》(Relations entre les types d'écriture et la langue)(《国际应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探讨》，第7期，巴黎，1958年)；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词条：《文字》(Письмо)(与 И. 季亚康诺夫和 P. 金扎洛夫合作)，《表音文字》(Звуковое письмо)，《音节文字》(Слоговое письмо)，《表意文

① 不久前苏联出版的 E. Doblhofer, K. Керам, I. Friedrich 的著作，论述后一个问题。

② B. 伊斯特林：《文字的发展》，莫斯科：1961年，共396页。

字》(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基里尔字母》(Кириллица)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因为本书是苏维埃时期第一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书中对许多一般历史学的术语和语言学术语都下了定义,一些最重要的日期都加以注明;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例如,古代埃及,苏美尔),则采用苏联历史编纂学所用的分期法。

本书第1版于1961年问世之后,受到了苏联和国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引出许多评论^①。此外,出版社和作者本人收到了苏联最著名的学者B. B. 维诺格拉多夫、H. И. 康拉德、B. A. 雷巴科夫、M. H. 季霍米罗夫诸院士,苏联科学院B. A. 谢列勃连尼科夫、A. A. 西多罗夫、П. H. 波波夫各位通讯院士,B. A. 阿尔捷莫夫、E. A. 鲍卡列夫、И. M. 季亚康诺夫、H. П. 基谢廖夫、C. A. 科波尔斯基、M. A. 科罗斯托夫采夫、C. Я. 卢里耶、A. И. 马尔库舍维奇、И. M. 鄂山阴、A. A. 列福尔马茨基、A. Г. 斯皮尔金、C. И. 拉齐克、И. M. 特隆斯基诸教授,以及Г. M. 邦加尔德-列文、T. B. 文采利、И. C. 卡茨涅利松、A. A. 列昂节夫、B. П. 斯塔里宁的评论和意见;国外许多学者也寄来了意见,他们是:Д. 波格丹(罗马尼亚)、З. 库伦迪奇(南斯拉夫)、A. 卡普尔(民主德国)、Ф. 穆齐卡(捷克斯洛伐克)、K. 库耶夫(保加利亚)、M. 科恩(M. Cohen)(法国)。作者在准备第二版时对上述评论和意见都一一加以考虑。作者借此机会对所有这些批评、意见表示感谢。

与第一版相比较,本书第二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增加了内容^②。

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某些更确切的说明,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一些:在保持把文字理解为起源上补充有声语言的交际手段的同时,特别强调,在现代人们生活中,文字所起的作用,较之有声语言,不是小

① 参阅:《哲学问题》,1962年,第10期;《文学问题》,1962年,第5期;《语文科学》,1963年,第4期;《历史档案》1963年,第1期;《古代历史通报》,1963年,第2期;《苏联出版物》1962年,第9期;《书的世界》,1962年,第6期;《书籍》论文集,1962年,第7期;《新世界》,1962年,第5期,等等。

② 作者1963年发表的《斯拉夫字母1100周年纪念》一书作为第九章的基础。

了,而是更大了;现代人借助文字所获得的信息比借助言语要多得多;词的书写形式现在几乎成为如同词的语音形式一样体现概念的物质外壳。根据这一情况,对科学符号的理解也作了一些改变;这些科学符号从起源上说被解释为“术语符号”,但按其用法则解释为表意符号。对于最原始的文字,我们采用了“句意文字”这一术语^①(整体表达,不分成一个个的词)代替“图画-综合文字”这个笨拙的术语,同时把这一文字类型分成为几种造型的图画符号和最古老的约定符号;用同“表音词字”(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логограмма)相对立的术语“表义词字”(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логограмма)来代替 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огограмма(“意符词字”)这个术语。

与本书第1版不同,第2版有特别的章节阐述古代的约定符号这是句意文字的两种基本类别之一(另一种为图画字)(见第三、四章);此外,第2版还阐述复活节岛的文字(见第四章)、墨洛埃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A和法埃斯特圆盘的符号(见第五章)、伊特拉斯坎文字、亚美尼亚文字和格鲁吉亚文字、希腊文字的各地方变体、拉丁文字发展史(见第七章),希伯来文字和东方其他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的历史(见第八章),分析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起源(见第九章),等等。对于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历史以及不同民族的书面文献的制作和形成,本版也加以简要叙述。

由于补充了上述内容,所以第2版的篇幅比第1版增加很多,但是,尽管篇幅增加了,本书所阐述的还远不是文字理论和历史的全部问题,而只是某些最重要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题目特别大的缘故。显然,作者一个人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把这一内容广泛的题目包罗无遗的。

^① “句意文字”这一术语最先为美国文字学家 I. Gelb 所使用(见本书第29页)。翻译时是从俄语字面意义(Фразография)直译这个术语。——译注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及其与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1 文字理论的首要的问题就是文字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字的用途如何,它使用的手段是什么,它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怎样。

有声言语同劳动一样是思维形成的条件之一^①,是人们交际的主要工具。

文字的产生比有声言语要晚得多。由于社会的发展,有声言语不再能满足人们交际中已增长了的和复杂化了的需要,这时文字才应运而生。

尽管有声言语具有许多优越条件,但它也有重大缺陷:这就是受空间的限制(言语只在短距离内可以听见)和受时间的限制(言语只在说话时才可以听见)。的确,在发明了扩音器、电话、无线电之后,言语的空间限制已部分消除;发明了录音机之后,言语的时间限制也部分消除了。但是这些传达和记录言语的工具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才制造出来。然而,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要求:把言语传达到远处并把它在时间上固定下来。

最初,采用各种方式来满足这种要求。为了把信息传达到远处,曾使用烽烟、篝火、击鼓作为信号;为了把信息在时间上固定下来,曾使用各种有象征意义的实物,例如土冈表示墓地,篱笆表示所有权,

^①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分音节的言语同劳动一起,成了思维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作者引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2年俄文版。根据德文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中文本作“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按,德文 Sprache, 俄文译作 Членораздельная речь, 英文译作 articulate speech。——译注)

箭头表示方向;而最发达的形式是秘鲁印卡人的结绳,美洲印第安人的珠串(见第三章)。但是一种最方便、最确切的传达和固定信息的画图方式——文字逐渐地广泛传播开来。至于“实物”传达信息的方式,则主要用来当作传达到远距离的信号,很少用于记忆的目的。

文字同语言和思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已经牢固树立了这样的观点:把语言看作是思维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①列宁在自己的著作^②中发展了这一原理。这一原理还受到苏联现代从事思维和语言相互关系问题研究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支持。

上述一切,无疑都属于以概念和判断形式进行的抽象思维。

与抽象思维不同,感觉-形象思维是以感知和表象形象的形式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可以不必通过词语形式而实现,尽管现代人的感觉-形象思维也是以存在发达的语言为基础的;例如,回忆看过的戏剧,如果不同时理解和评价所看到的東西,那么这种回忆就可能是一连串具体的、几乎在词语上没有定形的感觉形象。概念和判断的情况有所不同。“既然我们凭感性知觉马上得不到全部树木的共同特征,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由我们划分出来的共同特性的特殊的物质承担者。词就是这样的物质承担者。尤其是当需要把凭感性不能领会的现实中事物的特性和关系的思想加以固定和具体化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词。”^③

但是,如果语言是进行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必要条件,那么文字则只能在语言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因为甚至最古老的文字几乎总是表达某些共同的(其中包括抽象的)概念。然而任何一个共同的概念(更不用说抽象概念了)如果没有语言来表达它,就不可能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4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2,277页等。

③ 高尔基:《语言在认识中的作用》,《思维和语言》论文集,莫斯科,1957年,第98页。